

教师着装的教育符号学阐释与建构

陈 锐^{1,2}

¹六盘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六盘水

²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 广西桂林

【摘要】教师着装作为教育实践中的显见现象，其深层的符号意涵与育人机制尚待系统阐释。从教育符号学视角出发，将教师着装置于“符号互动”与“身体叙事”的理论透镜下予以考察，剖析其意义生成的“锚定”与“自然化”机制，旨在阐明这一符号系统在教育场域中稳定运作并产生效力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证教师着装作为文化符码、职业标识与关系媒介，在文化传承、身份建构与情感调节三个维度上所具有的育人价值，进而推导出相应的符号编码伦理规约，并建构从专业表达达到课程融合的实践路径。该研究试图超越一般经验性讨论，为理解教育中的身体与符号实践提供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关键词】教师着装；教育符号；身体叙事；伦理规约；育人实践

【基金项目】2024 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年度课题（24KSB003）：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现代阐释及当代价值研究

【收稿日期】2026 年 7 月 5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8 月 3 日

【DOI】10.12208/j.ssr.20260263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attire in education

Rui Chen^{1,2}

¹School of Marxism,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Liupanshui, Guizhou

²Research Center for Marxist Theory and Regional Practic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Abstract】 While teachers' attire presents a highly visible element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its underlying symbolic meanings and pedagogical mechanisms still demand systematic clarification. Educational semiotics provides the analytical foundation here, allowing the research to examine teacher attire through the twin lenses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bodily narrative." Analyzing how meaning generation relies on mechanisms of "anchoring" and "naturalization"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 that sustains this symbolic system's stability and influence in school environments. From there, the inquiry conceptualizes teacher attire as a cultural code, professional identifier, and relational medium, evaluating its educational value across cultural transmission, identity formation,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These theoretical links further pave the way for defining ethical boundaries in symbolic coding and establishing actionable pathways from professional expression to curriculum integration. In doing so, the study moves past simple empirical description, providing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interpret embodied and symbolic practices in education.

【Keywords】 Teacher attire; Educational semiotics; Bodily narrative; Ethical norms; Educational practice

引言：作为教育符号的教师着装

服饰礼仪作为人际交往与社会秩序建构的重要文化规约，在社交实践尤其是教育互动情境中，常发挥着先导性的符号表征与意义传递功能。尽管理性认知提

醒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但交往主体通过视觉直观捕获的着装形象，极易迅速触发并形成具有心理定势特征的符号解读机制。这种基于符号系统的前理性认知——亦称为“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①——作为

作者简介：陈锐（1975-），山东泰安人，博士，硕士生导师，六盘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贵州六盘水），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广西桂林），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政治教育、政党文化建设。

① 亦称“第一印象效应”，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希（S.E. Asch）于 20 世纪 40 年代在认知实验中观察到。其后，卢钦斯（A.S. Luchins）在 50 年代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正式提出该概念。指个体认知过程中，最先接收的信息会形成强烈而持久的初始印象，并成为后续信息加工的核心框架。其机制在于信息加工的优先性——后续信息往往被同化、整合进先前的认知图式中，并受前摄抑制影响。研究表明，首因效应引发的认知启动效应在强度与持续性上均显著优于后续信息。

意义生成的初始起点,往往持续作用于人际关系的动态建构与调整过程。心理学家 E.B.赫洛克指出,服装“作为自身的一部分”^[1],不仅折射出个体的审美取向、文化资本与社会角色,更构成其内在素养、能力与心理特质的外化表征。管仲所倡“服虔固亲”论^①,将服饰规范提升至治国理政与社会伦理的高度,彰显了古人对服饰社会整合功能的深刻洞察。步入现代文明,当物质丰裕已实现代际跨越,服饰选择早已超越基本的生存与蔽体需求,升华为个体进行文化资本积累、身份认同建构与社会交往表达的重要路径。适宜的服饰选择不仅关涉个体的自我表征诉求与主体性建构,更是现代公民社会角色扮演与职业伦理素养的直观显影。

由此可知,符号互动遍及所有社会领域。具体到教育场域而言,“亲其师,信其道”的古训深刻揭示,教育效能的实现不仅有赖于教学内容的显性传递与教学方法的理性设计,更深植于教育主体间具身化、情境化的隐性互动之中。教师着装形象,作为一种流动的、可视的“文本”,构成了师生互动中关键性的非言语交流介质与教育符号。学习者通过视觉感知与思维抽象,与教师形象进行“对话”,这一过程激活了“教育主体间性”,使教师的服饰符号系统天然承载起文化濡化功能——作为审美资本、职业伦理与文化价值的复合载体,它不仅形塑学习者的视觉认知图式与审美情趣,更通过符号互动中的“意义赋予”过程,积极参与学生价值观念的文化型构。这种潜在而深远的认知与育人效应,引发了现代教育学的核心关切:教师职业着装应遵循怎样的价值逻辑、伦理规约与实践范式?

当前教育政策虽基于多样性考量,未对教师着装作刻板统一规定,但其核心取向仍是构建一套契合教育本质、彰显职业特性并发挥育人功能的符号表征系统。正如教育社会学研究所指出的,教师的外在呈现是其专业身份与权威的重要构成,在本质上是一种“象征性控制”;这种控制经由“教育领域的再语境化话语构建和传递,从而使其获得意识形态属性”^[2]。因此,遵循特定价值机理与伦理规约的着装,既能实现具身化的师德表征与专业身份建构,又能通过教育场域中的符号化影响,触发学习者的审美移情、价值认同与行为模仿,最终推动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有机融合,形成协同育人效应。

1 从符号到意义:教师着装的意义生成逻辑

教师的着装作为动态生成的视觉符号意义系统,既承载着教师个体的身份表达与审美选择,又始终处于特定的教育文化语境之中,成为一种重要的师生互动媒介。要理解其意义生成过程,就需要融合符号学的意义建构逻辑与认知心理学的信息接收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揭示教师着装如何作为一种教育符号,在日常接触中潜移默化地传递价值、塑造关系。

1.1 服装、着装与服饰的符号意涵

在物质层面,“服装”(clothing)通常被定义为“穿于人体起保护和装饰作用的制品”^[3],它是人类文明演进最直观的物质确证之一。从人类学视野审视,服装的起源与发展史,近乎一部微缩的文明进化史。远古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裸态生活阶段”,直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穿用毛皮等制成的衣物”,新石器时代农耕文明的出现,则带来了纤维织物的革命^[4]。对此,我国古代文献亦记载了这一进程:上古之世,“衣皮带茭”^[5],而后伴随文明演进,人们逐渐“垂衣裳而天下治”^[6]。这一从“求暖”到“求丽”的演变,印证了“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7]的人类需求发展规律。对此,马克思将满足“穿衣”等需求的生产活动定位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8],深刻揭示了服装所根植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基础。

然而,若仅将服装视为静态意义上的“物”,则难以触及作为文化与社会现象的核心意蕴。因此,有必要引入一个更具动态性(put...on)、丰富性且与“穿……”(dress...; wear...)相关的概念——“着装”(dress)。在学术语境中,“着装”不仅涵盖衣物本身(服装),更包括所有形式的人体修饰与装扮行为,它是一个指涉“身体的社会性呈现”^[9]的整合性概念。与此相应,作为着装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服饰”常被用以指代包括服装及其各类配饰(如鞋帽、首饰等)在内的整体修饰系统。这些可见的符号元素共同参与个体形象的建构与意义的表达。华梅等学者指出,着装行为始终伴随着主体“试图通过所着服装来更好地塑造自我形象的心理活动”^{[10]②}。这意味着,着装是一个主动的、充

① 战国时期思想家管仲曾言:“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出自梁运华校点的《管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② 在这里,着装心理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随着分工的出现,要求着装要符合体力和非体力劳动行为的需要,这是人类摆脱低级动物走向直立行走之后,特别是接受了体表外加物即服装之后普遍存在的心理活动;二是着装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个性超群意识,以“求新”、“求异”、“炫耀”乃至“求怪”、“求随意”等为表征,其是超越本能的社会化的结果;三是着装者主观意志上企图通过形象塑造来减弱社会冲突,以为实现某种目标扫清障碍,这是社会或团体对自我所具有的一种无形的约束与压强的作用力的结果(参阅华梅、戴范的《服装艺术教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212页)。

满意图的符号化实践过程。也就是说,主体依据特定的社会角色、场合规范、审美理想及个人诉求,对服装及其配饰进行选择、搭配与穿戴,从而将内在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定位,编码为一套可视的外在符号。

从符号学理论来看,教师的“着装形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Semiotic System)。在这一系统中,服装的款式、色彩、面料、纹样、配饰乃至整洁度,共同组成了符号的“能指”(Signifier),即其物质表现形式;而这些“能指”所关联、指向的“所指”(Signified)则极为丰富多元:它可能指涉教师的职业身份(如专业、权威)、个人品格(如严谨、亲和)、审美品味(如高雅、质朴)、文化态度(如传统、开放),乃至其对教学与学生的重视程度等。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尽管能指(法文 *signifiant*, 指语言的“音响形象”或更广义的“形式”层面)与所指(法文 *signifié*, 指与音响形象相联结的“概念”或“意义”层面)^①之间的联系在本质上是任意的,但一旦在特定文化中被约定俗成,便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1]。在教育文化语境中,“西装革履”或“素雅裙装”之所以常与“正式”、“庄重”的教师形象关联,正是这种符号约定性的体现。因此,教师的着装实践,本质上是教育者在学校这一特定“符号场域”中,依据职业伦理与育人目标,持续进行自我形象符号编码与传播的自觉意识与实践。

1.2 意义生成的“锚定”与“自然化”

如果说符号学解释了教师着装“是什么”以及“如何表意”,那么教育符号学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符号系统“如何被接收”、“如何被解读”并产生“持续性影响”的意义生成机制。这一机制涉及符号的“锚定”(Anchorage)与“自然化”(Naturalization)^②两个关键环节。

在教育符号学视域中,教师的着装形象作为一个符号集群,并非被动地被学生接收,而是在既有的文化、教育和社会认知框架中被主动解读。罗兰·巴特指出,图像(可扩展至视觉符号系统)的意义往往是“多义性”的、“游移不定”的,需要通过文字或其他符号来固定其意义(即“锚定”),以“防止隐含意义向过于个体

化的方向肆意蔓延(换言之,它限制了图像解读的投射空间),也避免了其导向负面的价值取向”。^[12]在教育语境中,教师的身份标签、教育机构的权威性、以及社会关于“教师”角色的共享文化知识,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锚定”系统。例如,当学生面对一位新教师的着装形象时,他们便会不自觉地调用这一锚定系统,对视觉符号进行快速解码,并将其意义固定在与“教师”角色相关的特定范畴内(如知识、权威、可信赖等)。这一过程可被视为符号认知的“启动”阶段,它并非纯粹的心理效应,而是一个深植于文化符号惯例之中的意义规约过程。

此外,符号的“自然化”机制则解释了为何某些着装符号的意义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容置疑。事实证明,经过反复的社会实践与文化强化,特定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被制度化、习惯化,最终演变为了看似自然的“神话”(Myth)^[13]。例如,“整洁的白衬衫搭配深色西裤”这一能指,在教育文化中已被自然化为“严谨、专业教师”的所指。这种自然化使得符号的意义趋于透明,接收者不再质疑其关联的合理性,从而使得该符号所传递的价值判断和身份认同得以稳固延续。教师通过得体的着装符合这类自然化的符号惯例,能够迅速建立起积极的“初始符号印象”(即前文所说的“首因效应”)。这一印象作为意义解读的初始框架,将持续影响学生后续对教师言行、教学内容的符号化认知,形成意义解读的路径依赖。由此可见,相较于转瞬即逝的语言与表情,着装形象凭借其视觉优先性,呈现为一种“更鲜明、更持久、更稳固”的静态符号遗留^[14]——这也从符号的物质性维度,印证了其意义的稳定性。

“锚定”与“自然化”共同构成了教师着装符号意义生成的双重机制。前者在认知的起点进行引导与规约,塑造了积极的“第一印象生产力”;后者则在文化的深处完成固化与传承,确保了教育角色规范的代际延续。理解这一机制,不仅在于揭示着育人功能背后的文化逻辑,更在于引导教师从符号学的高度,将着装自觉建构为一种专业化的“非言语课程”。正因如此,教师着装形象育人价值的重要性,在此获得了坚实的

①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中创立了现代符号学的基本理论,他将语言符号界定为由“音响形象”(image acoustique)与“概念”(concept)结合而成的心理实体,并分别用 *signifiant* 与 *signifié* 这一对法文术语指称;其后,在韦德·巴斯金(Wade Baskin)的权威英译本《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1959)中,它们被分别译为 *signifier* 与 *signified*。高名凯的中译本则据此经典英译,创造性地将其译为“能指”与“所指”,此译名精准传达了“能够指示某物的形式”与“被指涉的意义概念”之内涵,已成为中文世界公认的标准译法。

② “锚定”指通过语言文本引导并固定视觉符号的多重意义;“自然化”指特定的文化意义在历史中被反复建构并最终被视为自然的过程。二者均为罗兰·巴特符号学的关键概念。(参见罗兰·巴特的《神话学》,许蔷蔷、许绮玲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9-222页;及其《图像修辞学》一文)。

理论依据。

2 教师着装育人价值的多维呈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5]教师着装不仅关乎个人形象，更是深植于教育现场、持续参与育人过程的符号实践。其价值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与教育目标、文化语境及师生互动的持续对话中生成、传递并实现转化。具体而言，教师着装的意义系统在以下三个维度上展开其育人功能，形成了一种从文化传承到关系建构的递进式价值生成路径。

2.1 文化符码的叙事传承与价值表达

从文化意义来说，服装作为“穿在身上的历史”，凝结着人类物质实践与精神追求的双重结晶，是历史记忆、审美观念与社会规范的具身化载体。作为民族文化最直观的符号呈现与活态传承，服饰以物质形式铭刻着文明演进的烙印。中华文明历来重视“衣冠礼乐”，《左传》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6]这里便深刻揭示出，服饰不仅是外在装饰，更是文明身份与礼乐精神的外显，其美感与文明认同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符号化的联结。教师着装，首先是一种文化符号的具身化展演。它通过款式（如立领、盘扣蕴含的中式韵味）、纹样（如梅兰竹菊象征的君子品格）、色彩（如中国红代表的吉庆热烈）等一系列可感知的视觉符号元素，向学生进行着无声而持续的文化叙事。这种叙事既关乎形式之美，更承载着深厚的价值意蕴。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激荡的今天，教师倘若有意识地在其职业着装中恰如其分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如改良中式衫、蕴含传统工艺的配饰），或是在对外交流场合以自信、大方、得体的现代中国教师形象出现，其行为本身即构成了一种生动而直观的“文化自信”教育实践。它超越了单纯的言语说教，借助视觉符号的直接性与感染力，宣告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尊重与创造性传承。这种“上所施，下所效”^[17]的符号示范效应，能够在学生心智中早早播下文化自觉与自豪的种子，进而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与文化观，增强其对本土文化的归属感与辨识力，从而有效抵御文化虚无主义，实现以文化人的价值定向功能。从符号互动的整个过程审视，这实质上是教师主动选取与组织文化符号进行意义编码，学生则在观看与解读中解码这些符号，逐步内化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的完整教育过程。

2.2 职业身份的专业呈现与学生人格的形塑引导

在微观教育社会学层面，教师着装是其职业身份

最外显、最日常的符号标识。统一的制服（如某些学校的教师工装）是一种强烈的制度性身份符号，而即便在没有统一着装要求的学校，教师的日常衣着也往往在实践中逐渐沉淀为一套非正式的“职业着装符码”。这套符码不仅象征着教师的专业属性、职业伦理与教育理念，也无形中成为教育场域内一种稳定的视觉规范。

“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18]着装作为一种非言语的“身教”，与言语的“言教”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教师的整体教育表达。得体、庄重的职业着装，通过符号的象征力量，持续向学生传递着严谨治学、认真负责、尊重场合、自律守序的职业伦理与行为规范。它强化了教师的角色自觉，使其外在视觉形象与“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内在职业要求相统一。从符号解读机制来看，一个符合职业符号惯例的初始形象，能迅速激活学生认知框架中关于“可信赖专家”的图式，并建立起基于符号认同的信任感，从而为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扫清心理障碍。这种由视觉符号触发的心理认同，往往先于理性认知而发生，成为教育关系中一种基础性情感与态度铺垫。

此外，着装本身就是最贴近生活的美育教材。黑格尔认为“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19]。教师着装的和谐、雅致与品味，正是其内在理性修养、审美格调与生命态度的感性外化。这种外化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教师在自我审视与社会角色认知基础上的一种有意呈现。这种直观的、日复一日的审美符号熏陶，能逐步提升学生对形式美、仪态美、气质美的感受力与判断力，进而引导他们追求更高层次的品德之美、智慧之美与心灵之美，在润物无声中促进其健全人格与完整人性的养成。这里，教师的着装已然超越了实用与装饰，成为了一种“审美符号”，其育人功能也在通过美的符号化实践，激发着学生对美好人格与生活的向往与建构。换言之，教师着装既是对其职业身份的视觉彰显，亦是一种关于美与理性的无言教学。

2.3 师生情感联结与教育氛围的符号调节

教师着装不仅是个人仪表的表现，更是调节师生心理距离、优化课堂情感氛围的微妙工具。基于符号所具有的情感启动功能，亲切、整洁且富有活力的着装往往能在第一时间传递出友好、开放与接纳的视觉信号，激发起学生“亲其师”的初始情感倾向。这种积极的情感联结，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好感，而是逐渐沉淀为一种稳定而信赖的心理纽带，成为学生愿意“信其道”的重要情感基础。在此过程中，教师的着装实际上扮演了一种“情感先行符号”的角色，它以非强制、非言语

的方式,为建立良好的教育关系铺就了第一段人文路基。

更进一步看,着装符号所承载的亲合力、对生活的热忱以及对自我形象的认真管理,本身就具有持续的情绪感染力与行为示范性。它如同一道背景光,有助于在课堂中营造一种既保持必要结构秩序、又流淌着人文关怀与精神温度的学习氛围。这种氛围的营造,并非抽象的理念传递,而是通过教师每日稳定的着装实践,逐渐转化为学生可感可知的课堂体验与文化记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有意识地在不同教育情境中灵活调整着装风格——例如在运动会上以运动服展现活力与参与感,在学术讲座中以正装传递严谨与专注——这一行为体现的远不止是对场合形式的尊重。它更是一种深层教育共情能力的外显,是对教育对象心理状态与教育内容内在气质的真切关照。这种通过符号调适所展现的灵活性与情境敏感性,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社交智慧与教育艺术的直观示范。

这种符号化的情境应对,能够有效拉近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逐步构建起更为平等、融洽、高效且具有建设性的互动关系。从符号互动视角深入审视,这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符号交换与意义协商过程。教师的着装选择与变化,作为一种主动的“符号姿态”(symbolic gesture),持续向学生发出特定的关系信号与情感暗示;学生则通过观察、解读这些视觉符号,产生相应的认知反馈与情感反应。师生双方正是在这种长期的符号互动中,不断校准彼此的理解,共同协商关系的边界与温度,从而协同建构出一种积极、良性且富于生产性的教育互动氛围。这一过程,不仅直接提升了课堂教学的即时效果,更实现了教育关系在视觉表征与情感实质层面的双向塑造与深层巩固。

3 教师着装符号编码的伦理规约

教师着装的符号实践并非个人趣味的无限延展,而是在教育这一具有明确伦理属性的公共场域中展开的。因此,其符号编码过程必须接受一套源自教育本质与社会期待的规范性伦理规约的约束。这些规约旨在确保着装符号的“所指”与教育目标保持一致,从而发挥积极正面的育人功能。

3.1 简洁大方:聚焦教育本体的纯净性

“简洁”强调符号元素的精炼与克制,避免冗余、繁复与过度装饰;“大方”则注重符号呈现的得体、自然与从容,摒弃造作、局促与俗艳。这一原则的核心伦理指向,是确保教师的着装系统服务于“教育”这一本体目的,而非成为分散学生注意力的视觉干扰。

培根曾说过:“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美丽。”^[20]同样,教师的学识、智慧与人格魅力,亦需在简洁大方的着装衬托下愈显光辉。这种对服饰得体性的重视,在中华传统中亦有深远体现。《南齐书》载思远“立身简洁”,遇客“辄使人先密窥视,衣服垢秽,方便不前,形仪新楚,乃与促膝”^[21]。这一行为虽反映的是古代士人交往中的衣冠之礼,但其背后所呈现的,正是将外在仪容视为内在修养与对场合尊重的重要符号。这不仅呼应了“衣贵洁,不贵华”的传统生活美学,更体现了教育工作者应崇尚精神丰盈而非物质浮华的职业伦理要求。

在实践层面,简洁大方具体表现为应避免那些过于暴露(如露肩、露背、露腰、低胸)、过度紧身、透视或带有强烈娱乐化、性感化倾向的服饰。此类着装容易引发与教育无关的联想,破坏课堂应有的专注、庄重与纯粹性,本质上会构成对教育神圣性与学生认知心理的干扰。从符号学角度看,这类服饰的能指强烈指向“身体”“性感”或“娱乐”等所指,与教育场域中“知识”“理性”“教化”等核心所指形成冲突甚至对抗,从而导致符号意义的混乱与干扰。因此,简洁大方的原则,实质上是对教育环境符号纯净性的维护,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导师生将心智聚焦于知识与思想的深层交流。

3.2 协调统一:追求情境和谐的整体性

协调统一原则要求教师的着装系统既在内部各要素间形成有序关联,又要与外部多重语境达成动态平衡,从而实现一种有机的、富有教育意蕴的和谐。这一原则深植于中华文化“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2]的哲学智慧,在符号学上则体现为对“关系”与“语境”的高度自觉与主动调适。

首先,是符号系统内部的协调。这包括服装色彩搭配的和谐(如遵循“三色原则”以维持视觉整洁)、款式风格的统一、以及配饰与服装的整体匹配。杂乱无章的符号组合会传递出混乱、随意、缺乏条理负面信息,进而削弱教师形象作为符号文本的内在连贯性与说服力。其次,也是更具教育实践意义的,是着装符号系统与外部语境的协调。这至少涵盖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其一,与着装者自身的协调,即服装需契合教师的年龄、体型、气质等特点,做到“人衣合一”,使服饰成为个人内在气质的自然延伸,而非刻意的掩饰或表演;其二,与职业身份的协调,着装应符合教师作为知识传播者与价值引导者的社会角色期待,其符号意义应与该角色所承载的核心价值——如理性、权威、关怀——相呼应;其三,与具体教育情境的协调,日常教学、学术研

讨、校园庆典、户外实践等不同场合,蕴含着不同的“语境预设”与“符号期待”,教师的着装需与之相适。

基于此,教师应当具备一种“符号情境智慧”,即能够敏锐感知不同教育场合的符号需求,并灵活调整自身着装策略,使外在形象与教学活动的内容、氛围及目标形成有机统一。这不仅可以传递稳重、得体、富有修养的视觉信号,更能在潜移默化中体现对教育本身的深度尊重。协调统一原则生动诠释了符号意义的“语境依赖性”(context-dependence),表明教师的着装实践始终处于具体时空、社会角色与教育关系的持续互动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情境对话里,其教育意义才得以真正生成和实现。

3.3 端庄高雅:彰显职业精神的格调性

“端庄”指向仪容的端正、持重与肃穆感,体现了对职业与场合的尊重;“高雅”则强调品味的超脱、优美与文化意蕴,彰显了精神世界的丰饶与深度。端庄高雅原则超越了形式层面的得体,更指向教师着装符号所应传递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格调,构成了一种深层次的职业伦理要求。

教师的职业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劳动与思想引领,其外在形象理应成为其内在精神高度的视觉映射。正如《立郢王嗣谦为皇太子制》所赞“端庄特秀”^[23],《三国志》评人“体高雅之弘量”^[24],古人早已将外在仪态与内在禀赋相联系。因此,教师着装应自觉摒弃任何形式的粗俗、媚俗、油腻或轻浮,积极追求一种含蓄、儒雅、富有书卷气与人文关怀的风度。端庄高雅的着装,是对“教师”这一职业内在神圣性与崇高感的外在维护与视觉确认,同时也会向学生与社会传递出一种明确的价值观信号:教育是一项严肃而高尚的事业,从事教育者,其精神世界与外在风貌皆应体现更高层次的秩序与美感。

此种通过日常着装传递的视觉熏陶,实则构成了一种持续的价值观教育。在频繁的师生互动中,教师端庄高雅的着装形象能引导学生向往文明、尊重知识、崇尚精神层面的高雅。从符号学角度看,端庄高雅原则要求教师着装的“能指”所关联的“所指”,不应停留于物质、身体或流行文化的表层,而应能自然唤起关于“精神”“文化”“修养”“格调”等更高层级的符号联想与意义解读,从而使着装真正成为承载与传递教育精神的可视化载体。

4 从符号理论到教育情境的着装实践

理论所阐释的价值内涵与伦理规范,最终需融入教师日常而鲜活的教育实践。教师着装形象的塑造,并

非寻求某种固定不变的模板,而是一个需要教师发挥主体性、在教育现场的真实情境中进行动态形塑与灵活调适的创造性过程。这一过程的展开,正是符号学理论在具体教育情境中的实现,它要求教师超越被动的规则遵循,成为自身形象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与教育对话的积极发起者。

4.1 以着装为媒介的专业身份建构与意义赋予

教师的着装实践,其首要功能在于清晰建构并有效传递“教育者”这一职业身份。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自觉的符号意识,使着装成为其专业素养、职业责任感与教育情怀的视觉延伸。邓小平曾深刻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关键在教师。”^[25]教师的形象气质,正是这种“关键”要素中最先被学生感知的部分。因此,在选择着装时,教师应有意识地进行自问:这套着装是否能增强学生对我作为一名合格教师的专业信任?是否有助于建立一种基于学识与人格的良性权威?

这实际上要求教师在个人审美表达与职业群体的社会期待之间寻求平衡。在风格上,宜选择能体现稳重、可靠、睿智与敬业特质的服饰;在细节上,面料不必奢华但应平整妥帖,款式不求时髦但求合身大方,色彩不宜刺眼但求柔和沉稳。有学者指出,“我们穿的不只是衣服,而是自己的修养,是我们所有的职业内涵和专业积淀。”^[26]着装实践的核心,便是通过视觉符号,将这种“职业内涵和专业积淀”与教师独特的个人魅力相结合,从而塑造出既值得信赖又独具风采的讲台形象。

进一步而言,这种着装实践并非机械地套用职业规范,而是在理解教育情境、把握自身角色基础上的一种主动表达。它要求教师不仅能在外观上符合职业期待,更能通过服饰的选择、搭配与整体呈现,传递出对教学活动的专业态度、对学科特点的把握,乃至对教育对象的尊重与关切。例如,文科教师的着装可能更显儒雅与书卷气,理科教师则可能偏向简洁与理性感,而艺术类教师的着装则可在得体范围内融入一定的审美创意。这种差异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教师在不同知识体系与文化气质熏陶下自然形成的外在流露,也是其专业身份的一种细化与深化。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主动的、策略性的符号化身份建构实践。

4.2 基于学生认知特点的着装调适与情感沟通

卓越的教育者必是深谙沟通之道的引导者,而一切有效的沟通,皆始于对沟通对象的真切理解。在教育语境中,教师的着装绝非无关紧要的个人装饰,它构成了一套直观、持续且充满表现力的非言语符号系统。这

套系统的运用效能,直接取决于教师是否能超越自我视角,深入学生世界,对其年龄特征、认知发展阶段、群体文化心理与审美倾向进行细致的体察与把握。只有在此基础上,教师才能对自身着装可能传递出的符号意义作出预判,并做出审慎而灵活的调适,使着装成为连接师生认知与情感的桥梁。

这种调适首先体现为对不同学段学生心理与认知特点的回应。例如,面对天真烂漫、注意力易被鲜明色彩与生动形象吸引的幼儿及小学低年级学生,教师的着装可以在确保安全、得体的前提下,有选择地融入明快柔和的色彩、亲切可爱的图案或富有童趣的细节。这般着装犹如一抹温暖的视觉基调,能迅速拉近与儿童的心理距离,营造出轻松愉悦、易于接纳的学习氛围,此时着装符号的核心所指在于传递“亲切”、“呵护”与“探索的趣味”。而对于处于心理敏感、价值观念形成关键期、自我意识高涨且热衷于同伴模仿的中学阶段学生而言,教师的着装则需转向稳重、素雅与富有内在品味的方向。过于花哨、随意休闲或刻意仿效青少年流行文化的装扮,非但难以引起共鸣,反而可能被视为不成熟或缺乏专业深度,从而削弱教师作为知识权威与精神导师的说服力。此阶段的着装,应致力于通过简洁的线条、协调的色彩与优质的质感,传达出“理性”、“涵养”、“可敬的榜样”以及“独立的审美人格”等符号意义。至于大学生及成人学习者,他们已具备较强的理性思辨与审美判断能力,教师的着装则应更为明确地呼应学术共同体的文化规范,体现治学所需的严谨、思辨所倡的开放以及学者应有的精神独立,其符号指向的是“智性的尊严”、“思想的对话”与“人格的完整”。

由此可见,基于学生特点的着装调适,其深层动力源于教师的亲和动机(affiliative motive)^①与高度发展的共情能力。它并非简单的投其所好,而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与理解基础上的、精细化的教育符号策略。这一策略要求教师如同一位细心的译者,将教育的专业语言与关怀,转译为不同学生群体所能欣然接受与理解的视觉语言。它超越了单纯的外在得体,上升为一种通过符号运用主动管理教育关系、营造积极互动氛围的高阶教育艺术,深刻体现了教育传播中至关重要的“受众意识”。正是在这种充满自觉的符号调适过程中,教师的着装得以真正融入教育沟通脉络,成为促进师生相

互理解、增进情感联结、提升育人实效的积极力量。

4.3 从符号展示到意义对话的着装课程化实践

教师的着装,不应仅仅停留于“自我形象管理”层面,更应被有意识地升华为一种宝贵的隐性课程资源,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这要求教师应超越服饰的实用与审美范畴,自觉将其视为一种强有力的非言语教育媒介和身体化的叙事文本。这意味着教师不仅要“穿得好”——即完成符合职业身份与社会期待的视觉“编码”,更要“讲得好”——即具备将日常着装现象课程化的敏锐意识与教育智慧,主动引导学生解读其背后交织的文化密码、历史记忆、社会规范与价值导向,使隐性的符号互动升华为显性的教育对话。

具体而言,这种教育实践可在三个层面系统展开:在学科教学层面,历史、语文、艺术等课程可深度挖掘服饰作为“穿在身上的史书”的文本价值,例如,透过服饰形制、纹样与材质的变迁,解码特定时代的政治观念、经济形态、技术水准与审美哲学,使学生理解服饰是历史的符号沉淀。在班会和生涯规划课上,可以把职业着装当成一套活的符号系统来读解:制服与正装怎样无声地立起专业权威,怎样传递一个行业的伦理,又怎样铸造公众的信任,其中蕴含着社会角色与视觉表征之间深刻的牵连。在日常生活中,老师可将校园内外那些追求个性或跟随潮流的穿着起话,发起一场不设标准答案的讨论,帮学生摸清“个性”与“任性”、“尊重”与“从众”、“审美”与“消费”之间那条常被混淆的界线,学着怎样透过穿着完成一次对自己负责、也对情境和他人有交代的沟通。正是在这种持续的、互动的符号浸润里,学生才可能从被动的符号看客,慢慢长成敏锐的解码者、理性的批判者,最后成为一个审慎而有意识的自我符号建构者。归根到底,整个过程的轴心,是“培养学生独立的审美价值”——让他们渐渐悟到,真正的个性不在外表的标新立异,它扎根于独立的精神和丰沛的涵养;真正的尊重,也不是被规矩架着走,它从内在的自尊出发,再自然流向外在情境与他人感受的周全体察。

至此,教师的着装彻底超越了个人仪表的范畴,从一种静态的、被观看的职业形象展示,转化为一种动态的、参与式的关系性教育实践;从一项被动的职业规范要求,升华为一门主动的、关于身份建构、文化传承与

^① 是美国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D.C. McClelland)提出的重要社会性动机之一。指的是个体渴望与他人建立、维持友好亲密人际关系的普遍而内在的心理驱动力。其核心表现是寻求被他人接纳、喜爱、认同,并避免被排斥或孤立。在管理、教育及组织行为等领域,亲和动机常与“成就动机”、“权力动机”并列,用以分析个体的核心需求与行为倾向(参阅《The Achieving Society》,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1961)。

社会融入的生动课程。它标志着教育者的自觉——将一切可利用的日常资源,转化为滋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社会性情感与健全人格的养料,从而真正实现了从细微的符号实践到深远育人目标的升华。

4.4 公共伦理框架内符号表达的自由与边界实现

作为社会公共人物,教师的形象不仅属于个人,更属于职业共同体,还承载着社会对“师道尊严”的集体道德想象与期待。教师身份决定了其着装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在特定公共场域中进行的、受社会契约约束的符号表达。因此,教师的着装自由,必然要以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职业道德规范为基本边界。该边界从符号互动角度看,划定了教师视觉符号“编码”的伦理语义场域与社会可接受区间。

网络时代,个别教师因着装过于新潮、暴露或怪异而引发舆论争议的案例时有发生,这从反面确证了教师着装的公共属性与符号责任的严峻性。教师必须清醒认识到,校园是个以教育性、示范性与保护性为核心的公共文化空间,讲台更具有无形的仪式感与庄严性。那些在私人或娱乐语境中可能被接受的时尚元素(如过度破洞的牛仔裤、带有争议性文字或图像的服饰、过度凸显身体性的装扮等),一旦置入课堂这一特定语境,其符号意义便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扭曲与逆变。这种“扭曲”不仅损害教师个体的专业形象,更会侵蚀教师群体的整体符号资本,消解教育环境应有的严肃与纯净,并对处于价值观形成期的学生产生混淆视听的示范风险。从符号学机制分析,这类服饰作为“能指”,其原生亚文化语境中的所指(如个性解放、潮流前沿)与教育主流文化所要求的所指(如端庄、理性、专注)构成了直接的对立与冲突,其符号实践也因此成为一种对职业伦理与社会期待的“冒犯性编码”。

因此,教师的审美权利与个性表达,必须在公共伦理与职业规范的框架内审慎行使。这绝非压抑个性,而是引导个性在更高维度上实现创造性转化。追求时尚与表达自我,完全可以通过富有巧思的配色、精致的配饰细节、优质而得体的面料与剪裁来实现,其艺术性与专业性远胜于对底线的简单挑战。最终目标,是实现“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和谐统一”,使教师的着装形象能如其春风化雨般的言谈与严谨求实的治学一样,成为其深厚学识、高尚师德与优雅品味的有机外显与自然流露,从而赢得学生与社会的由衷认同与深度尊重。这便要求教师在着装的符号编码过程中,时刻兼具创造的智慧与自律的自觉,在个性表达与职业共性、审美自由与文化规约之间,寻找到那个既能体现自我、又能赋

能教育的最佳平衡点,从而完成从私人着装者到公共教育者身份的内在统一与外在实现。

因此,教师的审美权利与个性表达,必须在公共伦理与职业规范的框架内审慎行使。这绝非压抑个性,而是引导个性在更高维度上实现创造性转化。追求时尚与表达自我,完全可以通过富有巧思的配色、精致的配饰细节、优质而得体的面料与剪裁来实现,其艺术性与专业性远胜于对底线的简单挑战。最终目标,是实现“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和谐统一”,使教师的着装形象能如其春风化雨般的言谈与严谨求实的治学一样,成为其深厚学识、高尚师德与优雅品味的有机外显与自然流露,从而赢得学生与社会的由衷认同与深度尊重。这便要求教师在着装的符号编码过程中,时刻兼具创造的智慧与自律的自觉,在个性表达与职业共性、审美自由与文化规约之间,寻找到那个既能体现自我、又能赋能教育的最佳平衡点,从而实现私人着装者与公共教育者双重身份的内在融合与外在协调。

5 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着装形象是一个深植于教育文化语境之中的复杂符号系统,意义远超出个人仪容的范畴,其构成了一种关涉文化传承、身份建构、关系调节与价值引导的符号化实践。在教育符号学的理论视野下,教师着装是由能指与所指共同组成的、具有主动编码性质的意义体系;其意义的生成、传递与固化,深受符号锚定、自然化以及语境协调等机制的作用。这一分析框架为我们系统理解教师着装的教育意蕴及其持久影响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

因此,当代教师应以自觉的文化意识、职业理性与符号敏感,重新审视并构建自身的着装实践。在价值认知上,须充分体认着装作为文化符码、身份标识与关系媒介的多维育人功能;在伦理遵循上,应坚守简洁大方、协调统一、端庄高雅的基本规范,以确保符号表达与教育语境的和谐统一;在实践操作上,需灵活运用符号策略,在职业特征、学生特点、教育目标与社会期待之间达成动态平衡,并主动将着装转化为具身化的育人资源。

通过塑造既体现专业权威又蕴含亲和力、既彰显文化品格又展露个人特质的着装形象,教师不仅能够为积极的师生关系奠定符号基础,更能在日常的教育互动中,借助持续、稳定且富有教育意向的符号化表达,将外在的形象之美,转化为浸润心灵、引导成长的育人力量。最终,教师的着装形象当与其学识、师德与教学艺术相辅相成,共同塑造出可信、可亲、可敬的“人师”

形象,在无声的符号实践中,传递教育的深远力量与精神高度。

参考文献

- [1] [美]E.B.赫洛克.服装心理学[M].吕逸华译.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86:35.
- [2] Bernstein B. Class, Codes and Control(Vol. 4): 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150.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GB/T15557-2008 服装术语[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8:1.
- [4] 参阅冯泽民,齐志家编.服装发展史教程[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8:6.
- [5] [春秋]墨翟.墨子[M].李小龙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37.
- [6] 周易[M].宋祚胤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370.
- [7] 说苑.程翔评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959.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 [9] 参阅 Eicher J B, Roach-Higgins M 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dress: implications for analysis of gender roles[M] // Barnes R, Eicher J B. Dress and gender: making and meaning in cultural contexts. Providence: Berg Publishers, 1992:8-23.
- [10] 华梅,戢范.服装艺术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10.
- [11] 参阅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Baskin W, trans. Bally C, Sechehaye A, ed.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67-69.
- [12] Barthes R. Rhétorique de l'image[J]. Communications, 1964(4):44.
- [13] 参阅[法]罗兰·巴特.神话学[M].许蔷蔷,许绮玲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8:169-222.
- [14] 李美霞.服饰形象的首因效应与晕轮效应[J].天津纺织工学院学报,2000(05):47.
- [15] 论语[M].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89.
- [16] 春秋左传正义(第二册).[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7:2272.
- [17] 苏宝荣.《说文解字》今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129.
- [18] [宋]范晔.后汉书(卷三五·卷七五).[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99:944.
- [19] [德]黑格尔.美学[M].寇鹏程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5.
- [20] [英]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人生[M].何新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207.
- [21]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7:852.
- [22] [春秋]子思.中庸译注[M].李春尧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6:5-6.
- [23] 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1部.第1册(总第1册)[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269.
- [24] 许嘉璐.三国志(第一册)[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411.
- [2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8.
- [26] 钟亮.语文教师形象的内外修炼[J].语文教学通讯,2016,(08):27.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